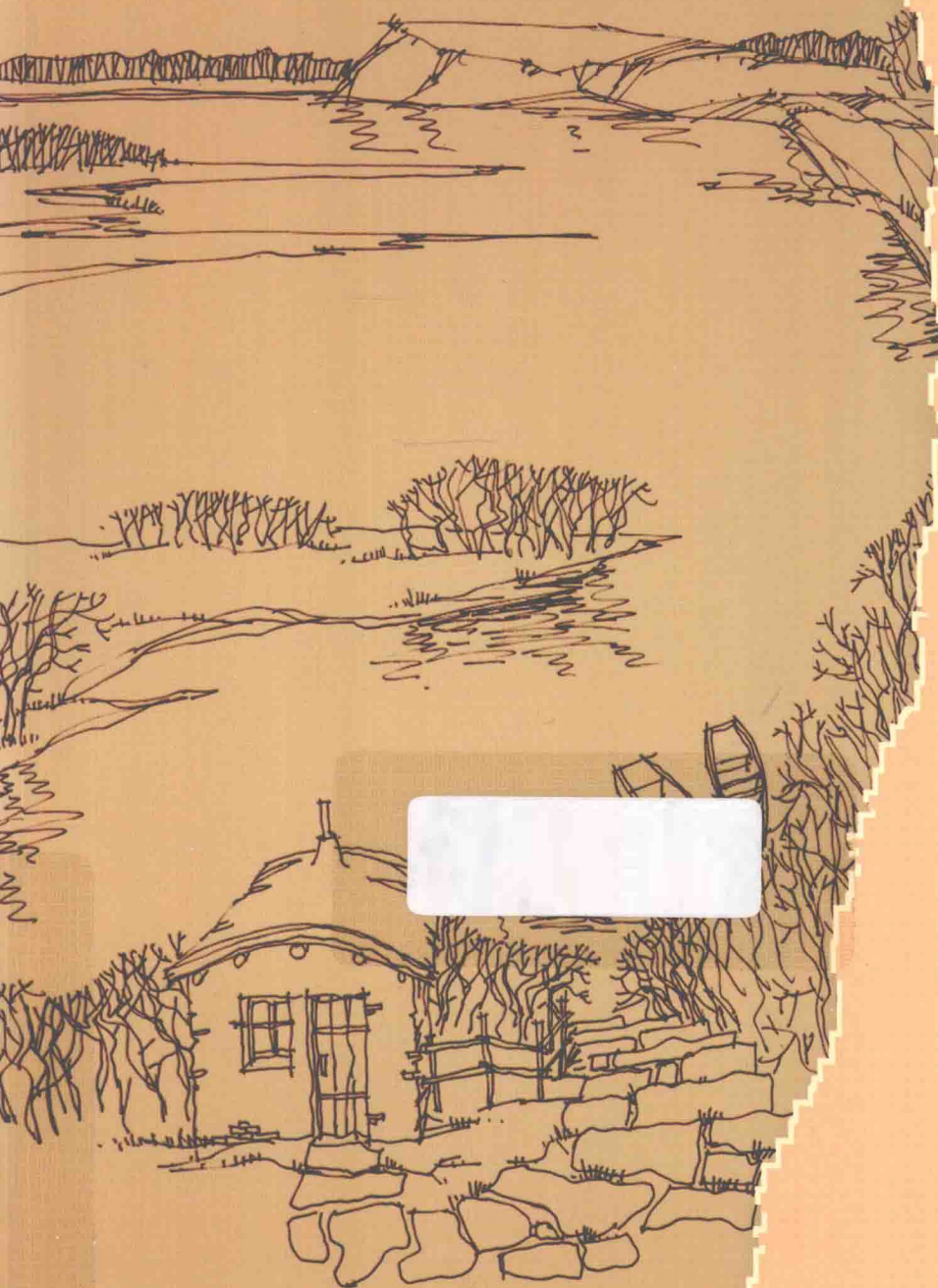


拉林河畔

余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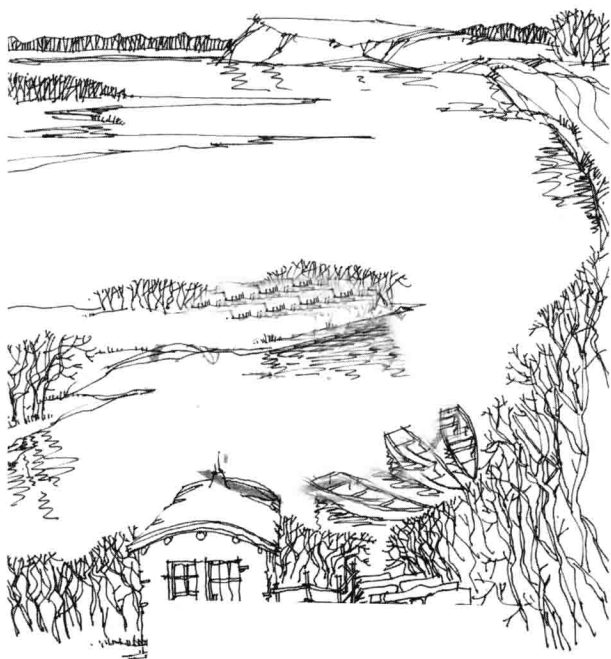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拉林河畔

余 立 著



2011 年的秋天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林河畔 / 余立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30 - 2626 - 0

I. ①拉… II. ①余… III. ①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257 号

责任编辑: 刘 睿 徐 浩

文字编辑: 徐 浩

责任校对: 韩秀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拉林河畔

Lalinhe Pan

余 立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13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保定市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一版

字 数: 120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2626 - 0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liurui@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我的现实生活	(4)
三、下放谢家屯	(12)
四、搜索谢家屯	(21)
五、寻找谢家屯的路上	(40)
六、抓赌	(57)
七、等待春天	(70)
八、重回谢家屯	(83)
九、拉林河畔的悲剧	(95)
十、四十年前的房东	(103)
十一、记忆中的离别	(115)
十二、故友重逢	(129)
十三、归途中的意外	(136)
十四、悲剧后面的悲剧	(146)
十五、结尾	(166)

一、引言

谢家屯是一个在所有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庄，但它对我来说既是记忆，又是梦境，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它给了我人生最初的多种体验，包括生死、情感、快乐和困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谢家屯的一个个场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里。特别令我不解的是，有些梦中发生的事情与谢家屯的记忆毫无关系，但那些事情总好像发生在谢家屯的某个地方。

其实，从四十年前离开谢家屯的那一天起，我就期待着有一天能再回去。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重回谢家屯的初衷虽然有所变化，但这个期待从来都没有从我心里消失过。时隔四十年的这个秋天，我终于动身了。这个决定似乎出于很多的原因，但我却又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哪个原因让我为之非去不可的。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感觉引导我回到了谢家屯，这种感觉就是寻找心灵慰藉的本能需求。这个小村庄成了让我从茫然和困惑中得以摆脱、得以释怀的去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往事在大脑里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思维光顾记忆的频率越来越高。一直以来，我都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记忆是最真实、最准确的，以至于我时常用往事作为参照，来评估和判断自己现实的处境和生活价值的取向，而且，每当思维涉及往事，我都会对记忆中显示出的信息确信无疑。

但是，近一两年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记忆并不完全真实，它往往掺杂了很多主观的意念，特别是对于那些久远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当初就一闪而过的情节已经慢慢淡出。沉淀下来的，更多的是自己当时最深切的感受，以及自己当时的主观判断，而淡出的部分，会带走大量原本真实的事实信息。这样，记忆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残缺、越来越偏执。回想起来，谢家屯除了带给我童年最尽情的快乐之外，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些许疑惑，特别是谢家屯的人们对我们家人的态度的突然变化，不仅在当时让我感觉无奈和无所适从，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找出答案。而四十年的时间几乎把这些疑惑磨灭了，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了那段随心所欲的快乐时光。

2011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生活改变，现实的体验让我意识到，过于信赖不完整的记忆会导致自我迷失。我一直认为，现实的努力正给自己带来物质生活的满足以及周围人们的尊重和认可，它带给我的是自我价值的证明。这次生活的变故让我发现：证明自己，已经慢慢地成为我做事的起点和动力，同时，这也是我屡屡挫败、渐渐变得懦弱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我的思维惯性面对了现实的无情挑战。过去让我自信的理由不再可以完全依赖，我突然感觉脚下的地面在松动、在塌陷。我必须立即逃离这尴尬的境地，对此，最直接、最本能想到的去处就是那些美好记忆的产生地。而第一个从脑海里跳出来的地方，就是谢家屯。

我本想通过记录回到谢家屯的过程来解释清楚是什么驱使我回到那里，以及这段记忆到底能给我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什么。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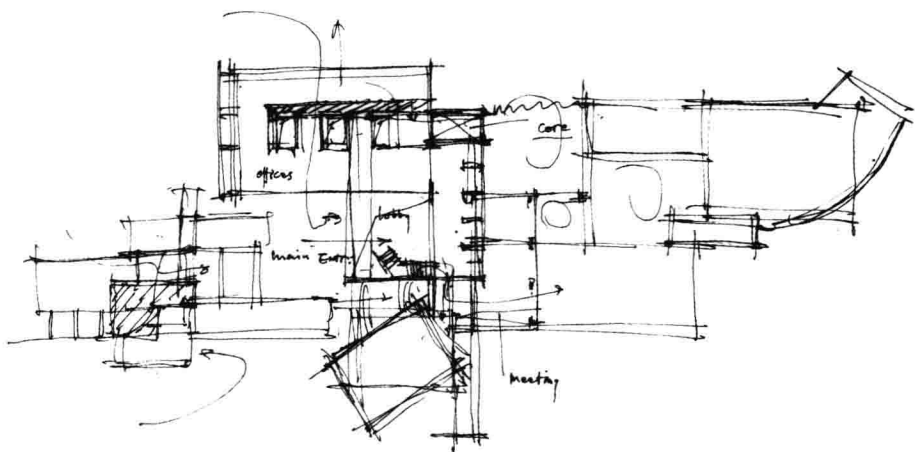
而，对故地和故人的访问，让我得知了更多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而关于这些背后的故事，我要么当时全然不知，要么是对一些迹象没有关注或完全忽略。这次谢家屯之行，让我有机会解开长达四十年的、几乎快被淡忘的困惑。我突然发现，那些伴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记忆居然与真相相去甚远，过去我一直信赖的记忆，竟有如此多的缺失和误解。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变化，这个变化包括自身和周围的事物。但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之所以我们能感受到变化，是因为我们同时也感受到了恒定，变迁的发生一定要有恒定的陪伴。人们往往把关注几乎给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却对固定不变的事物视而不见，总是忽略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来说，固定不变的事物不是一种物质，它们是我们大脑里的一种符号，这就是记忆，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记录，它们会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记忆，让记忆保持清晰、准确和完整。重回谢家屯，让我再次验证了那些我脑子里恒定的记录，梳理和补充了我那已经残缺的记忆。这个过程让我体验到了修正记忆是如何重要、如何美妙、如何让人震撼。它们可以给予我的现实生活巨大的帮助，让我能更准确地感受到自身以及周围的变化。

我们应该关注和适应自己身边的变化，但同时，也不要忽略不曾变化和不会变化的往事，不要低估它们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让我们的记忆保持健全，让事实尽可能真实地、完整地留在脑子里。这就是我要写下这次谢家屯之行、讲述这四十年前的故事的初衷。

二、我的现实生活



在北京朝阳法院的第七审判庭里，我和方菲分别坐在原告和被告席上。在聆听完法官宣读离婚判决书后，我们两人均表示对判决书的内容没有异议。离婚判决书很快盖好了章，我和方菲各领取了三份。从朝阳法院出来，我和方菲简单地相互寒暄了几句就朝各自的车走去。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原本还犹豫是否要在一起吃顿散伙饭，但看样子，她好像已有约在身，我也就没提起此事。

我坐进自己的车里，下意识地启动了发动机，等把车开到路上之后，却突然发现自己不知该去哪里。此时此刻，我的大脑一

片空白，甚至好像已经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行为。我开车的动作全都是出于本能，完全没有受到意识的支配。就这样，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来转去。

过了好一阵，我才恢复正常的意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失去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我大半生的努力前功尽弃，我的自身价值荡然无存。尽管我还有一个过得去的事业，那却已不是完整生命了；我也有一个体面的住处，但那现在只是一个居所而已，已不再是家了，因为那里已不再有构成家的基本元素。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有了没了家就没了归属、心灵就没了栖息之处的感受。这种感受，在走出朝阳法院的一刹那，是如此的强烈，是我最初想要离婚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我此时极其需要找到一个能立即接纳我的地方，见到一个能给予我些许女性温情的人，听到几句来自一个女人的宽慰话。没想到，一直自认为不屑儿女情长的我，在办完离婚手续的一瞬间，感情上也会突然变得如此脆弱。

我在脑子里搜索着，看看谁是即刻可以找到、可以对其倾诉并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慰藉的人。我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唐欢，一个性格开朗、言行随意的女孩。她原是公司办公室的行政助理，因为交了一个富二代男友，不再需要上班挣钱，大约在半年前把工作辞了。唐欢不拘小节，甚至有点儿没心没肺，同事拿她开玩笑，她从不生气。我与她说话可以完全不动脑子，也没什么顾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有些话不够得体，也不会招致严重后果。虽然唐欢离开公司已有半年，但她有时闲着没事还会不时过来看看，打个招呼，或约从前的同事吃

饭、聊天。

唐欢无疑是此时最适合约见的人。我拿起电话，开始拨打她的号码。电话接通了，可是这次接通的声音有些异样。不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唐欢的声音：“喂，是谁呀？”她的声音好像是从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比平常微弱许多。

“是我，关明。”我答道。

“哟，关总，怎么是你呀？啥事儿？”我的电话明显让唐欢感到意外。

“看你有空吗，想找你聊聊。”

“啊，找我聊啥呀，是想请我回公司上班呀？哈哈。”听得出唐欢此刻心情不错。

“不是，就是随便聊聊。有空吗？”

“有空是有空，但是这会儿我不在北京，我在马尔代夫呢。”唐欢回答道。

我马上记起来了，几天前好像听说她要 and 男友出国旅行。我有些尴尬，赶紧地自找台阶：“哦，不好意思，等你回来再联系吧，祝旅途愉快！”

唐欢说了一声“那好吧”，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在脑子里继续搜索着，试图找到另一个目标可以立即前往。一张善良的面孔在脑子里突然闪现，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她就是李鑫盈。李鑫盈是一家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三十多岁的未婚女人。几年前，我们为她所在的地产公司设计过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并因此与她相识，而且有一段比较频繁的工作交往。李鑫盈为人和蔼，通情达理，人也长得端庄匀称，是我们众多客

户中难得一见的、与其沟通会感到轻松愉悦的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有了一些工作以外的话题。最初是相互讲述出游的经历，后来我开始给她展示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拍的照片。渐渐地，我们之间偶尔会有一些非工作性质的见面。李鑫盈是一个喜怒哀乐不溢于言表的人。我们在一起聊天时，她总是听的多说的少，如有令她感觉愉悦的地方，她也只会露出淡淡的微笑。像李鑫盈这样的“剩女”在当今的中国并不罕见，她们往往很优秀，而且自视甚高，绝不甘心下嫁一个自己认为不够优秀的男人。在与李鑫盈的交往中，我感觉她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印象中那种“剩女”的超级自恋情结。她也不排斥与男人的正常交往，只是在交往中有着严格的分寸把握。我们在非工作的交谈中，一直遵守着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之间的话题从不触及各自的私人生活。我们都没有试图打探对方或向对方透露自己的生活状况，交谈的用词都比较谨慎，好像经过了各自严格、仔细的过滤。

我迟疑了一会儿，不知这会儿约李鑫盈见面是否妥当。但迟疑过后，最终还是不由自主地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那头没人接听，我一看车里的时钟，还没到下班时间，估计她在开会。这时，我还开着车在路上毫无目标地行驶，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把车开到什么地方了，眼睛看到的和内心感受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电话响了，是李鑫盈打过来的。

“关总，你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

“我离婚了。”不知是因为脑子完全停止了工作，还是嘴已不受思维的支配，我脱口而出。

“什么？……”

可以听得出李鑫盈对我的话感到非常意外，她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电话那边沉默了。在与李鑫盈的交往中，我从未流露过我与方菲之间的情感问题，她对我的家庭生活状态知之甚少。我这样唐突地告诉她我离婚了，就我们过去交往的性质来说，的确不妥。虽然此刻我还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中，但还是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感到少有的尴尬，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在一段沉默之后，我用忐忑不安的口气问她：“你下班后有时间吗？我刚从法院出来，一时有点儿发蒙，想找个人聊聊，说几句话，缓解一下。”

不知是因为还没从我突如其来的电话中回过神来，还是为难，李鑫盈过了好一会儿才再开口：“对不起，关总，今天不行，我晚上约人了。”她的口气平静得像静止的水面。

我又一次面对着拒绝，心里既失落又难堪。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已经下意识地开车开进了自己居住的小区。我把车停在家门口，走进屋里。方菲虽已搬走有一个多月了，但这次回家却让我感觉这里已经完全不同了。对我来说，它再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个家了。保姆小贾把做好的饭菜摆在桌上，她自己已经下班走了。女儿慧伊听到我回来的开门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看着我面无表情，就轻声地对我说：“老爸，回来了，吃饭吧。”

慧伊是我和方菲唯一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去芝加哥上大学了。当我最初有了离婚的想法时，为了尽量不影响她，本想等她出国以后再说，但犹豫了一阵后，还是决定先

告诉她，并想听听她的看法。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慧伊对我和方菲婚姻问题的见解远超出我的想象，她对我离婚想法的理解和接受也远超出我的想象。我没用过多的解释，她就表示离婚是我和方菲的一个正确选择，这样对我们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

我默默地坐在餐桌前，一句话也说不出，端起饭碗低头吃饭。只感觉胸口堵得慌，呼吸变得不顺畅，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挤压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慧伊又说了些什么，我居然一句都没听进去。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发现慧伊两眼还是一直在盯着我。看到我有了回馈的眼神后，慧伊赶紧问我：“老爸，你还好吧？”我回了一句：“还行。”就立即低下头接着吃饭。

我不知道慧伊是否能意识到，结束这一段持续了二十五年的婚姻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对我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此时她的表现要比我镇定得多，我也不想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太多的伤感，所以一直在回避她的目光、她的问话。可是，这会儿我克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实在有限，我此时的脸色一定极其难看，慧伊可能也看不下去了，就说了一句：“老爸，别忍着了，要哭就哭出来吧。”一直在我眼圈里的眼泪一涌而出，我真没想到自己的情绪会如此失控，而且还是在女儿面前。我赶紧擦去眼泪，说了一句：“没事。”慧伊没再说话，走过来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肩膀。

手机响了，是李鑫盈打来的。我深呼了一口气，拿起手机。

“关总，你还好吗？”李鑫盈用非常关心的口气问道。

“还好。”我尽量使自己的声调听起来和平常一样。

“我把约会取消了，你过来找我吧。”

“哦，对不起，不去了，我已经约了别人了，谢谢你了！”我

的回答还是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本能地脱口而出。

我勉强地吃了半碗饭，就再也没有胃口了，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女儿，她的碗筷居然是一直没动。“你怎么不吃？”我问慧伊。她回复道：“老爸，你不吃了？那你先上去吧，这儿你别管了。”我说了一声“好吧”，就往楼上走。这时我的电话又响了，是母亲从上海打来的。我的父母十多年前就退休了，一直住在上海，不仅是因为他们更适应那里的气候，还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亲友。

“关明，离婚手续办完了？”不等我开口，母亲上来就问。

“妈，办完了。”我回答道。

“你非要离婚呀？你原谅她一次不行呀？”

“妈，咱不再讨论这事了。没准我再找一个媳妇，还能给您生个孙子呢。”我试图调侃一下，以缓解由于我的离婚给父母带来的不快。

“……”母亲那头一时沉默了。过了片刻，她无奈地说：“那你自己多保重吧。”

“您和爸要多保重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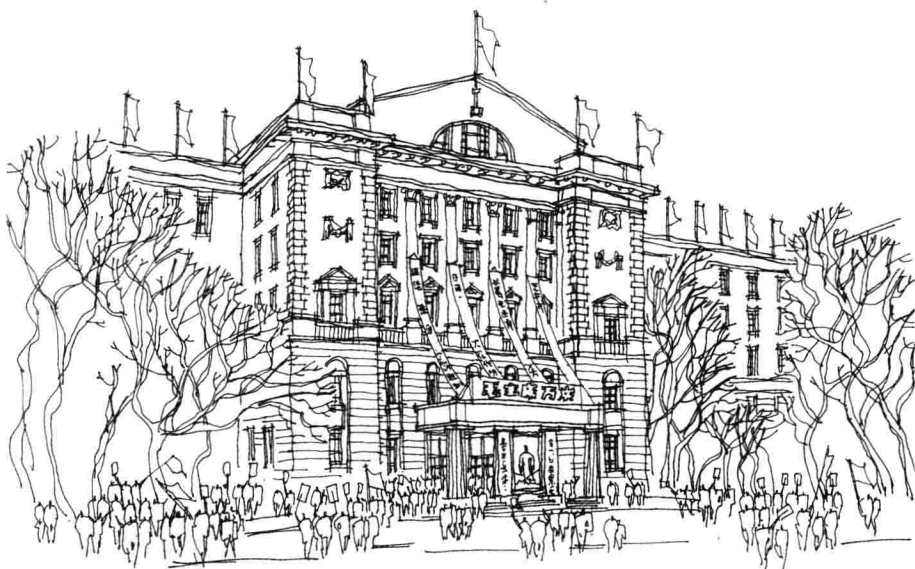
听我说完这话，母亲就没再往下说。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里都没传来任何声音，我拿着电话等着，不知道母亲还有什么话要说，也不好把电话挂断。

“我们知道。我和你爸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好好活着。”电话那头的母亲终于又说话了，但声音明显更加低沉。“你还记得何倩惠、何阿姨吗？妈妈过去的同事，一起去谢家屯插队落户的。”

“当然记得。”我回答道。

“她前几天去世了。两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聚会来着，她还提起你，提起谢家屯呢。”母亲的话里流露出她为一个熟悉并同行过的生命的逝去而伤感和无奈。她的话让我为之震动和感慨，我的思绪一下子从离婚的茫然和失落中转入对往事的回忆。我对父母过去的很多同事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对何阿姨的记忆尤为深刻，而且，我对她的记忆是和谢家屯联系在一起的，我眼前不由地又浮现出这个在记忆里存在了四十年的小村庄。

三、下放谢家屯



谢家屯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它进入我的记忆是在1969年，那年我10岁。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段。我的父母当时在哈尔滨的东北城建学院教书，哈尔滨以往的宁静和幽雅这会儿早已被狂躁和喧嚣所取代。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对比最鲜明的两类人，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两种极端的表情：一种是激昂和亢奋，一种是困苦和绝望。

激昂亢奋的人占据大多数。他们忙碌着，不停地参加集会、游行、宣传演出、贴大字报……他们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这也是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他们会在毛主席像前虔诚地表达对领袖的忠诚，他们也会对另外一类人表现出愤怒和憎恶；每当面对这一类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绝不手软。那些困苦绝望的一类人就是被认定为反对毛主席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角落里被揪出来，送进批斗会场，受到清算和审判。除了批斗会，这一类人一般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尽可能待在僻静的地方，而且总是低着头、沉默着，几乎从不正视别人，也从不主动与别人说话。而这会儿，占大多数的一类人对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蔑视就是横眉冷对，对他们说话的口气不是讥讽就是训斥。

东北城建学院的教学楼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地方，因为父母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把子女带到学院，这楼里成了我和小伙伴们一个相聚玩耍的场所。但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教学楼变得越来越恐怖，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阶梯教室变成了批斗会场。会场里不时传出激昂的口号声和愤怒的叫骂声，被批斗的人被粗暴地从会场押进押出。如果被批斗的人在批斗会后还能自理，在楼道昏暗的角落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孤独地坐在那里写东西。据说，是写自我检查或反省的材料，偶尔还会发现有人站在不远处监视着他们。

一天，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我看到几个年轻人把一个人从一间教室里拖出来，那个人的胸前挂了一个大牌子，似乎已没有了知觉。我当时感到非常恐怖，以为这人已经死了，但那几个年轻